

锡伯族迁居云南考

吴元丰 赵志强

锡伯族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明末清初,锡伯族居住在嫩江和松花江流域,后来被清政府编入满洲八旗,并分迁各地,驻防屯田。目前,锡伯族历史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有清一代锡伯族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迁移:第一次是康熙年间由嫩江和松花江流域迁到盛京和北京。^①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从盛京所属各地锡伯官兵内抽调一部分,迁到新疆伊犁驻防屯田。^②第三次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又从盛京所属各地锡伯官兵内抽调一部分,迁到云南驻防。今辽宁和新疆境内均有锡伯族,而云南境内却无。因此,有人怀疑锡伯族迁居云南一说,但无史料根据。

锡伯族迁居云南事,最早见于《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据该书记载:“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农历正月,清政府又从盛京所属各地挑选1000名锡伯壮丁到云南驻防,这是锡伯族第三次大迁移”。^③此后,有关文章均持此说。究其史料根据,《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主要参考了十几种书籍,其中只有《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记载了乾隆帝于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因缅甸战事飭派盛京锡伯官兵一千名到云南的谕旨。^④至于锡伯官兵到云南后的情况及事后是否撤回盛京等等,实录内未见记载。

笔者最近因工作之便,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满文月折档,发现几份反映清政府

(上接第124页)

存在的问题和对今后工作的设想

加拿大全国档案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全国缺乏一个统一领导的档案工作体制,因而造成各个档案馆工作的多样性,以及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和协作;(二)档案馆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联邦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因而档案经费不足。例如,一个规模较大的档案馆的预算只相当于加拿大一个大学图书馆预算的十分之一。各档案馆(不包括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在1978年用于收集文件资料的费用,只等于加拿大各主要大学图书馆用于收集图书资料的平均费用。资金不足影响了加拿大档案工作的发展;(三)组织机构的不完善影响了档案工作的标准化与专业化。

对今后档案工作的设想:(一)增加对档案工作的预算,建议联邦政府在1980/1981年度对档案事业的预算增加到3,200万美元,并建议将预算的主要部分用于建立加拿大全国性的档案体系方面,以省级档案馆网为基础;(二)建议修改1970年的公共档案馆法,以确定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在全国档案系统中的领导地位;(三)促进和加强对档案工作人员的训练与教育,加强对档案学的研究,以适应档案工作的发展。

(以上资料主要来自“加拿大档案顾问小组”给

“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协会”的报告)

调盛京锡伯官兵赴云南参战情况的档案,对澄清锡伯族是否迁居云南一事,颇有价值。据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十七日,乾隆帝谕军机大臣傅恒等曰:“著再传谕盛京将军,于新满洲锡伯兵内,拣选年力精壮、技艺优良者一千名,酌量兵数,于城守尉、协领内,拣派年力精壮、善于管束者各一员管带,陆续来京”。^⑤盛京将军恒禄奉旨后,立即“由盛京所属新满洲锡伯兵内,挑选一千名,酌量兵数,选派协领一员、城守尉一员、章京十二员、骁骑校十二员。”^⑥并将所选官兵编为两队,分别于四月初一日和初三日起赴京城。到京城后,改编为五队,从五月初起,先后起程,到七月中旬,均抵云南。^⑦锡伯官兵的任务,主要是驻守要塞,保护台站。同年十一月战争结束,即开始分批撤兵。“新满洲锡伯营原调来兵一千名,其中阵亡者十二名,伤口不愈而死者三名,关外病故者五十四名,关内病故者三十六名。死亡共一百零五名,今实有兵八百九十五名。又由闲散、幼丁内补充死亡兵额者四十四名,共有兵九百三十九名。”^⑧此项锡伯官兵被编入第十一至十五队。“第十一队:吉林兵四十四名,新满洲锡伯兵一百六十六名,兵共有二百一十名。管带侍卫孝顺、营长一员、章京二员、骁骑校四员。第十二队:新满洲锡伯兵二百一十名,管带城守尉额纳森、章京三员、骁骑校二员。第十三队:新满洲锡伯兵二百一十名,管带前清门侍卫鄂兰、营长一员、章京三员、骁骑校二员。第十四队:新满洲锡伯兵二百一十名,管带侍卫松轹、章京二员、骁骑校三员。第十五队:新满洲锡伯兵一百四十三名,厄鲁特兵六十六名,兵共二百零九名。管带前清门侍卫普尔普、侍卫哈萨尔图、章京一员、骁骑校二员、协理台吉一员、兰翎一员、护军校一员。”^⑨自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初六日起,挨队起程,撤回盛京。^⑩

经查阅云南地方志,亦无锡伯族迁居云南的记载。

综上所述,1769年清政府调盛京锡伯官兵到云南,不是一次大迁移,而是因有战事,临时抽调锡伯官兵去云南加强边防,因此,次年战事结束后,即全数撤回了旧地——盛京。

注:① 详见拙著:《锡伯族南迁盛京》,载《历史档案》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② 详见拙著:《锡伯西迁概述》,载《民族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③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第15页。

④ 参阅台湾华文书局总发行本:《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第16本,第11774页。

⑤ 军机处乾隆三十四年二月满文月折档。较晚编入满洲八旗的锡伯族,一般皆称“新满洲锡伯”。

⑥ 军机处乾隆三十四年二月满文月折档。

⑦ 参阅军机处乾隆三十四年六、七月满文月折档。

⑧ 军机处乾隆三十五年正月满文月折档。在此所说“闲散”、“幼丁”皆系锡伯官兵由盛京带去之限役。

⑨ 军机处乾隆三十五年正月满文月折档。

⑩ 参阅军机处乾隆三十五年正月满文月折档。

(上接第127页)

事业计,为学生计,为个人精力计,万万不能再事兼任”,因此要求“准予辞去教育科主任、教育系主任之职;但以教授名义,给予无俸之长假”,刘伯明于8月3日复函表示:“此间职务,敬从尊命,作长期之休息,八月一日起,请徐养秋先生担任”。

综上所述,陶行知系于1917年9月到南高师任教,初任教育学专任教员兼教务主任职务,1918年9月任教育专修科主任兼教务主任职务,1919年10月正式被聘为教务主任,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任校行政委员会委员、教育科主任兼教育系主任,1922年2月起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3年8月获准辞去东南大学职务后,才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